

国情研究第七号报告

民族与发展

——加快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MINZU YU FAZHAN



辽宁人民出版社

PDG

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间有着血肉相融的历史渊源，在血缘上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地域分布上则表现为“大杂居与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整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的发展和繁荣无疑会影响整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政策，这是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和自治权利、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经过“一五”、“二五”、“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20年的建设与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的经济社会面貌已得到初步改变，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原因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规律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区与东部和全国发展水平的差距有所扩大，这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曾明确提出：“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要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五中全会还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指导今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之一，并对中西部地

区采取了六条优惠政策。这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政治与政策保障。

为了积极响应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战略部署，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以《民族与发展——加快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为题的第7号国情研究报告已经问世。这是中国科学院为国家高层次决策服务的战略研究方面又一重要研究成果。该报告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一是主题思想比较明确，围绕如何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中心，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探讨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二是报告以研究民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探讨了影响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深入分析了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提出稳定与发展是该地区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强调要通过加快发展来促进稳定。三是提出了中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四个加快，社会发展优先，有条件的地区可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的构想，并提出若干对策与建议。相信这份报告对中央和民族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本报告的缺点是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论证还不够深入和充分，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和民族性，似乎也显不足。

我国国情分析研究的创导者周立三院士不幸于1998年5月逝世。我希望国情分析研究这一重要领域在继承、发展和创新中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陈宜瑜

1999年4月24日

前言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自“七五”末期至“八五”期间，已先后发表了《生存与发展》、《开源与节约》、《城市与乡村》和《机遇与挑战》4份国情研究报告。“九五”时期，又相继发表了第5号国情报告《农业与发展——中国21世纪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第6号国情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现发表题为《民族与发展——加快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第7号国情研究报告，这是为了缩小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差距，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项研究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启动实施，近三年来，我们不仅广泛查阅了有关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开发历史、民族政策演变、社会经济发展等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还深入到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8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进行实地考察，前后历时4个多月，并对省区、州（地）、县市（旗）三个层次基本统计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及制图，在此基础上形成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周立三院士一直十分关心本报告研究进

展，并提出加快发展、提高自主权和加强民族团结等重要观点。不幸的是，1998年5月当本报告初稿即将完成时，周立三院士与世长辞。这实在是我国国情分析研究的重大损失。谨以此报告献给周立三院士。

本报告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提要，经国情小组集体多次讨论，其中内容提要八易其稿。吴楚材担任主编和内容提要的主要执笔。总报告主要由吴楚材、张落成、张海亮、陈雯执笔。参加讨论主要人员有：石玉林、胡鞍钢、陈锡康、李立贤、王毅、康晓光、刘燕鹏、潘晓明、杨翠红、温军、陈家其、沈小英、朱振国等。分报告执笔人分别为：胡鞍钢、李立贤、陈家其、张海亮、沈小英、朱振国、温军、潘晓明和杨翠红等。

报告在调研期间曾得到国家民委经济司、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经济研究所，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人民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中国科学院计划局、资环局和科学时报社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本报告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特别资助，使用的数据部分来自于综考会的“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

1999年4月

中文提要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民族最多的大国之一，55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不足10%，却集中分布在全国国土面积60%以上的地区，并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政策，尤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为此，江泽民指出“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的第7号国情研究报告《民族与发展——加快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把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围绕民族与发展这一主题，分析了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特点，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影响该地区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深入研究了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潜力，明确提出实施“四个加快、社会发展优先，在有条件的部分地区采取跳跃式发展战略”的构想，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我国要实现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繁荣，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必须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这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出路。

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范围，如果按民族自治地方单元统计，包括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宁夏5个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青海、甘肃、四川、湖北、湖南等省所辖的地域上基本连片的自治州、自治县，土地面积60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5亿（1995年）；若按8个民族省区（即上述5个自治区以及贵州、云南和青海省）统计，土地面积为55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7亿。因受资料限制，本项研究更多地使用后一种口径。本报告主要内容和观点归纳如下：

一、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特点

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是一个地处边远，少数民族聚集，资源丰富，发展滞后的区域，其主要特点是：

1. 地处边陲和山区高原。中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是我国的边防要地、生态屏障和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即使在冷战结束、世界形势趋于缓和时期，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逐步改善，其战略地位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中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主要江河如长江、黄河以及珠江的最大支流西江的源头地，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要地，其生态环境状况维系国家生存环境安全，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这不仅会影响到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生存环境，而且还会危及东中部地区的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2. 少数民族聚集，但汉族比重较高。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1990年除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

占总人口比重达 96.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达 62.4% 外，其余各民族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在 50% 以下，汉族人口所占比重超过少数民族。这一特点说明了“两个离不开”，即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这种地域分布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3. 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中西部民族地区土地总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62.7%，占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土地总面积的 96.7%。该地区是我国草地、森林、水能和矿产等四类资源赋存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不仅自然资源总量大，而且人均占有水平高。其中水能、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磷矿、钾盐等矿产以及某些特色农产品和旅游资源，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5 年全国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分析表明，云南烟叶比较优势系数达 11.5，广西甘蔗为 10.0，新疆棉花为 7.9，均大大高于全国其他省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和重要基础，而且还将成为我国资源开发重要的战略后备基地。

4. 社会经济落后，地域之间差异较大。少数民族聚集的 8 个民族省区中，70% 的省区、60% 的地级单位和 70% 的县级单位均属于低收入或极低收入类型。1995 年 8 个民族省区人均 GDP 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61.5%。由于少数民族分布地域辽阔，无论在自然条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还是经济类型、民族文化等都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而在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民族特色。

二、中西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存在许多问题，归结起来是稳定与发展问题。稳定和发展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稳定是前提，发展是基础。通过加快发展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中西部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因素，与东部发达地区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主要集中反映在“五个相对落后”上。即：

1. 交通闭塞，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建国以后，中西部民族地区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是其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区域性交通网不发达，西藏至今未通铁路，公路网密度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公路等级低、路况差；电话普及率除内蒙古、新疆、宁夏等省区外，其他5个民族省区电话普及率只及全国的一半；在贫困地区还有相当数量不通公路、不通电话、不通邮的村镇。

2. 人口增长过快，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社会发育相对落后。这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1990年达39.5‰，为全国同期人口增长率的2.6倍；1990—1995年上升为40.3‰，其中青海人口增长率达60.3‰，内蒙古达55.8‰。然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口文化素质却没有同步提高。1990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除新疆、内蒙古外，大部分民族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2年），其中西藏仅1.81年，云南4.14年，贵州4.16年。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人口比重高达30.8%，比汉族高9.3个百分点。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普

及率为 78.7%，而西藏为 45%，青海为 58%，贵州为 61.7%，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人均报纸拥有量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内蒙古仅为 4.5 印张，贵州为 5.9 印张，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16.8% 和 22.1%。这表明知识以及知识传播广度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1995 年非农业人口比重为 19.2%，比全国低 3.4 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城乡发展差距大。

3. 贫困程度高，经济结构单一，发展相对落后。该地区为我国经济欠发达和区域性贫困集中分布的地区。在全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所列举的 592 个贫困县，中西部民族地区占 40% 以上；1996 年 5800 万未脱贫人口中，有一半左右人口集中在中西部民族地区。从财政状况来看，财政收入低，财政赤字严重。1994—1996 年 8 个民族省区地方财政自给率仅为 43.2%，绝大多数地区靠中央财政补贴和“输血”过日子。有些地方不但建设资金缺乏，而且有时甚至连正常的工资都难以兑现。经济结构不合理，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大，第二、三产业比重较低，1995 年工农业产值比为 63:37，农业产值比重较全国高 19 个百分点；所有制结构中，国有企业仍占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1995 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 44.9%，比全国同一指标（11.5%）高出近三倍，国有工业的利税比重达 88.3%，较全国 56.9% 的比重高 31.4 个百分点。

4. 外向型经济发展缓慢，吸纳外资能力低，对外开放相对落后。1995 年 8 个民族省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仅 90.2 亿美元，外贸依赖度为 14%，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3；实际利用外资 21.2 亿美元，只占全国总量的 4.4%。除拥有少数开放边境口岸和开放试验区等开放贸易形式外，缺乏诸如

东部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高层次贸易和开放形式。

5. 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深刻，新旧体制转换速度缓慢，改革进程相对落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建成的一批国有企业，由于资金、市场、体制等多种约束，尚未根本摆脱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二是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区域、民族等因素影响，经济观念、市场观念、竞争意识普遍比较淡薄，市场化进程发展缓慢，加上狭隘保守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乡土意识，使其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三是行政机构臃肿，行政开支大。吃“皇粮”的人员比重比全国高30%，有些省区行政事业费比重甚至是全国平均数2倍，远远超出了当地财政承受能力。

中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五个相对落后”，既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又有历史和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原因之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基础因素之一。因其区位偏远，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缺少出海口或距出海口距离甚远，加之沙漠、戈壁与山地、高原的阻挡，交通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民族地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地理区位的偏远、生态环境的脆弱，干旱、风沙、盐碱与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在不同程度上也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原因之二，历史因素的影响。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阶段很不平衡。建国以前大约有5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包括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景颇族等在内的少数民族，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西藏直到50年代末，仍长期保留着农奴制。旧中国的

中西部民族地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广大农村仍然属于自然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社会经济的低起点对其发展具有较强的影响。

原因之三，政策失误或失效。建国以后，我国除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外，还在财税、产业发展、扶贫、文教卫生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照顾政策，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以往在执行民族政策时难免出现忽“左”忽右的政策失误。民族地区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飞地式”经济，与当地经济缺乏内在联系，难以带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实施沿海重点发展战略，曾一度忽视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致使与沿海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许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比较适用的民族经济政策已失去原有的作用，或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这无疑使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的被动局面。

中西部民族地区必须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发展，以稳定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只有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跨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国力增强和地区的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三、中西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条件和潜力

中西部民族地区不仅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发展潜力，而且已经基本具备加快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从外部条件来看，一是具有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条件。尽管已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恢复后的亚洲仍有

巨大潜力，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最具增长活力和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由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较大改善，这为扩大开放和发展对外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和平环境。而且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地缘条件和时间差，加快边贸发展，有利于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二是随着综合国力增强，东部地区利用沿海开放政策，经济已得到快速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总体国力逐步增强、东中西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及时调整了地区发展战略，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九条重大方针之一，对中西部地区采取六条优惠政策，这表明中央更加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成为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三是国内正在进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为东西合作创造了良好机遇，也为下世纪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内部发展条件来看，首先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基础得到较大增强，投资环境正在向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转变。建国以后，经过“一五”、“二五”、“三线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与发展，经济总量已有了大幅度提高。1995年8个民族省区GDP总量达到5350亿元（当年价），按可比价格相当于1978年全国经济总量的1/3。农牧业稳定发展，工业基础得到加强，85%以上的农牧民已基本解决温饱，为今后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随着沿边开放政策的推进实施，不仅建成了沿边开放口岸体系，而且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大大改变了区位劣势。因此，中西部民族地区目前已成为全国陆路沿边开放的重要窗口，西北地区

已成为洲际通道枢纽，西南地区发展成了重要的区域性国际货物和信息通道。第三，中西部民族地区在许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例如，具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土地成本、相对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供应，以及某些专门技术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根据工农业产品比较优势分析，本地区的工业产品在能源、原材料、建材、化工、农牧产品加工、民族工艺品以及某些机电产品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农牧产品在棉花、糖料、烟草、水果、羊毛、羊绒和木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该地区在土地后备资源、草场资源、水能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旅游资源以及民族人文资源等方面，拥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因此，中西部民族地区可以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利用比较优势和独特人文环境背景等有利条件，发展特色经济和比较优势产业。如广西的“五年三大步”就是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追赶发达地区的典型实例。总之，中西部民族地区已基本具备加快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已到了努力把握机遇、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

四、加快发展的战略选择

面对日益扩大的地区差距，中西部民族地区选择何种发展战略至关重要。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常规式发展战略，即采用沿海发达地区颇有成效的发展战略，以较高的国内投资率促进加工业发展，特别是轻工业和家电工业发展，利用“三来一补”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贸易业等。由于中西部民族地区缺乏沿海地区的区位条件与经济优势，如果实施这种常规式发展战略只能与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中西部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

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差距，更突出表现为知识和信息上的差距。知识和信息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因素。要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其先决条件是缩小知识差距、技术差距和信息差距。因此，在有条件的部分中西部民族地区选择时机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有可能加快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所谓跳跃式发展战略，即运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充分利用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快速传播的机遇，实现新技术的跳跃发展，并通过技术上的跳跃来利用资源优势促进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优化，从而实现加快发展的目标。特别要说明的是，一是实施跳跃式战略，并非超越发展阶段，而是为了缩短发展进程；二是对传统的资源加工产业来说，也要高起点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更新换代，提高市场的竞争能力。例如，云南卷烟业进行设备更新时，从一开始就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不但缩小了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而且使其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三是要与民族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而不是照抄、照搬、硬套国内外发展模式。在具备条件的部分地区通过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从而逐步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1. 战略目标：逐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发展差距

可以分三步实施：第一步，抑制中西部民族地区（省级地区）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差距，特别是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差距的扩大；第二步，逐步缩小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第三步，逐步缩小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我们认为，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和沿海发达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形成，是一

个历史的过程，因而差距的缩小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认识差距，承认差距，利用差距，加快社会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差距，赶上全国平均水平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标。事实上，广西和新疆在 90 年代以来已经逐步缩小了与全国人均 GDP 水平的相对差距。

2. 战略内容：实施“四个加快、社会发展优先”

中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四个加快”的基本内涵是：

加快社会进步——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实施“科教兴民（族）”，改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条件，提高人口基本服务标准、成人识字率和文化科技水平。大力普及广播、电视，扩大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从而不断缩小知识差距。

加快经济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并重，总量增长与效率增长相结合；经济发展速度应高于全国平均速度，脱贫率和经济结构变动率应有大幅度提高；通过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提高地方经济实力和水平。

加快开放步伐——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打破区域封锁、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市场；扩大开放范围与广度，实施从口岸—开放城市—开放区域的全方位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大规模吸引外资，提高外贸依赖度，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竞争，逐步实现边境贸易自由化。

加快改革进程——从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结构和民族关系等方面，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模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加速行政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中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四个加快”的核心是优先缩小社

会发展差距，包括知识差距、技术差距和信息差距。通过优先缩小社会发展差距，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差距、开放差距以及改革差距的逐步缩小。同时还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瓶颈”等问题，改善投资环境。

3. 战略重点：实施三个重点突破

加快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应正确选择突破口，实施重点突破。所谓重点突破就是针对阻碍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有选择地发展那些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活化当地经济的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

(1)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突破。加快以交通、通信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打破地区封闭、加快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举措，也是振兴民族地区的首要基础工程建设。因此，要以超前意识和适度超前的标准，加快交通、通信、供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尤其是要利用当前劳动力供应充足、物资丰富且价廉等契机，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强区域性铁路、公路、航空网建设。二是大力改善贫困地区县乡一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供电和供水条件等。三是大力改善旅游设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 产业发展重点突破。自然资源丰富，资源优势突出，是加快中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物质资本。但这种优势大多是潜在优势，如何实施资源转换，将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是今后中西部民族地区长时期发展的重要任务。今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应以市场与资源为导向，以国家资源开发重点向中西部转移以及产业向农业、能源、原材料等倾斜为契机，积极发展资源加工型与新技术相结合的产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加工的附加